

《信仰的开花：日本祭典导览》书评

张 龙

对于民俗学或关心文化的研究者而言，宗教、信仰等往往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主题。与信仰相关的活动也因为丰富的文化意义、精致的文化物品、众多的参与者以及别具特色的仪式过程，而成为学界所关注的对象。《信仰的开花：日本祭典导览》一书便是一本聚焦于信仰文化及其相关活动的著作。

一、本书的作者、主题与构成

林承纬先生出生于1977年，2008年获日本国立大阪大学美学、民俗学／文化表现论专攻博士学位，现任台北艺术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艺美学及传统艺术。林承纬先生以台湾、日本为主要调查区域，对宗教造型、祭典礼仪、文化资产、生活技术等方面的传承文化进行研究，同时也注重民俗学的当代理论建构。其主要著作有：《宗教造型与民俗传承：日治时期在台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12年；《就是要幸福：台湾的吉祥文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2014年；《金瓜石神社与山神祭》，新北：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2014年；《信仰的开花：日本祭典导览》，新北：远足文化，2017年；以及《台湾民俗学的建构：行为传承、信仰传承、文化资产》，台北：玉山社，2018年。

为什么要研究日本的祭典？《信仰的开花：日本祭典导览》一书开篇给出了日本被称作“祭典王国”的原因。林承纬先生认为这一称谓不仅来自于日本祭典数量多，号称全年拥有三十万场之众；同时更是因为祭典在日本人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意义的生产场域与对象，因此大家乐于参与，从而使得祭典成为日本最具特色的国民活动之一。由于具有如此的地位，对日本祭典活动的记录与研究也就成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值得学界付诸实践的课题。林承纬先生在本书中选取了十多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祭典进行描述与分析。通过十一个章节与四则专栏的构成（表1），作者

将这些祭典的组成、表现、展开及意义一一向读者展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铜版纸印刷，搭配了超过三百幅照片，几乎全是作者在各地调查时的拍摄成果，因此能够最为直观地表述出日本祭典所具有的特色，以及作者希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

表 1：《信仰的开花：日本祭典导览》章节安排

序号	章节	标题
1	引言	信仰开花—NIPPON 祭典王国
2	一	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3	二	祭典与日本人
4	专栏	台湾现存的日本宗教信仰遗迹
5	三	祇园祭与山鉾巡行
6	四	天神祭与住吉大社例大祭
7	五	神田祭与佐原大祭
8	专栏	日本三大的文化考
9	六	关西的十日惠比寿与追傩式
10	七	名古屋的热田祭及周边的山车祭典
11	八	松尾大社御田祭与北野天满宫瑞饗祭
12	九	南都奈良的春日若宫御祭
13	专栏	四季、时令与祭典文化
14	十	福冈博多的祇园山笠祭及周边的山笠祭典
15	十一	青森的睡魔灯及台湾远征
16	专栏	日本祭典在台湾的景象

第一章分三部分介绍了日本当代社会中的宗教信仰现象。作者首先探讨的是宗教信仰在日本社会中所具有的多元特点。表现之一即日本人在生活中可能既遵从神道信仰，同时也参与佛教活动，因此在信徒的统计信息上，总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国民的总人口数。第二部分探讨了日本本土兴起的神道教，介绍了其中万物有灵的信仰特点以及在外来宗教刺激下形成信仰体系并发展为日本本土宗教的过程。第三部分探讨了日本社会中相当普遍的佛教信仰。介绍了佛教在日本的传入、发展、神佛习合以及与其日本人生活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谈到了祭典所具有的信仰与文化艺术特征，在作者介绍祭典的内

涵及相关构成时，能清楚地感受到祭典与日本人生活结合之深。在专题一中，作者则沿着日本宗教信仰的路径，介绍了神道与佛教信仰从日本传到台湾后的表现及发展历程。

在总体介绍了日本的信仰文化后，林承纬先生便从三个方面详细地展开了对祭典的分析。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介绍了日本三大祭中的京都祇园祭、大阪天神祭以及东京神田祭。作者分别从所在城市、历史起源、演变、具体组成、表现形式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对三大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专题二则以三大祭为契机，转而探讨日本独特的“三大〇〇”现象。如“三大祭”与“三大景”等等。在日本人对“三大〇〇”现象的描述与概括中，能够感受到其对于本土文化的热爱，以至于“三大〇〇”现象本身就已构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文化之一。

第六章到第九章分别介绍了关西的十日惠比寿与追傩式、名古屋的热田祭及周边的山车祭典、松尾大社御田祭与北野天满宫瑞穗祭及南都奈良的春日若宫御祭。在这四章中，作者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不同城市的祭典文化，更是介绍了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中祭典所具有的特点。专栏三则对因季节而异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作者提到，由于日本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因此造成了日本人对于大自然变化所具有的敏锐感知，能随着四季气候与景致的变化，举行不同的祭典，在传统社会中以维持农林牧渔的生计。在这样的介绍与论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祭典作为一种文化创造，与社会生活、生产等方面所产生的紧密联系。

第十章与第十一章分别介绍了福冈博多的祇园山笠祭、周边的山笠祭典、青森睡魔灯及其台湾远征。通过这一南一北两个祭典，作者向我们展现了日本全国各地盛行的祭典文化。在专栏四里，作者提到了日本祭典文化向外输出到台湾地区的现象。认为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向外传达了祭典文化中的热情与魅力。

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祭典背后的日本社会

日本的祭典以信仰及其文化为基础，林承纬先生在书中提到：“那股日

本人对信仰的崇敬及爱美的天性,更充分展现于祭典所呈现的造型、表征”⁽¹⁾。因此祭典活动的丰富与热闹,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可以进入到对宗教信仰的探讨之中。

1. 宗教、祭典与社会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在对宗教的论述中提到:“宗教是与神圣事物(即与世俗之物有别而被归入禁忌范围的东西)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将所有的信奉者团结到一个称为教会的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之中。”⁽²⁾从这一定义中可以了解到,对于宗教的构成而言,神圣、信徒与场所是三个必要条件。日本祭典的起源可能有各种传说或信仰体系,但总体上可以被视为这三者的统一体。在一场祭典中,众多的参与者构成了这一仪式活动中的“信徒”,祭典中的神道或是佛教信仰则构成了“神圣”的要素,而无论是寺庙、神社抑或山车经过的路线,相应即构成了这一仪式性活动发生的“场所”。由此,祭典成为宗教社会学视野中合适的分析对象。

“那整齐划一的神輿队伍,搭配着精神抖擞的呼喊声,往往成为日本祭典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³⁾,《信仰的开花》一书中多次出现了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作者对这些场景的描绘中,读者往往能够感受到超越个体的共同体氛围。正是这一对个体的超越性,使得我们看待祭典与宗教时能够看到其背后的日本社会。

涂尔干认为,在氏族或图腾崇拜中,某种特定事物能够成为图腾的原因并非出自这一事物本身,因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不足以引起群体成员间强烈的情感。由此而言,图腾只能是一种符号,它只是另外某种无形事物的有形表达。换句话说,宗教所拥有的神圣性并非因为这一神圣性本身,而是来自于神圣背后的特定事物。涂尔干认为这一能够引起群体成员强烈共鸣的事物即是社会本身。因为只有社会才能够在超越个体的同时,产生对个体的强制性约束力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能够感到身不由己,但却难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施加于自身的力量,因此以宗教信仰的方式解释这一现象,从

(1) 林承纬, 2017, 信仰的开花: 日本祭典导览, 新北: 远足文化。第44页。

(2) 涂尔干, 1999,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页。

(3) 林承纬, 2017。第72页。

而使得整个世界变得有意义并可以为人所理解。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我们在看待日本社会中的祭典时，能够理解祭典作为社会的化身这一现象。在祭典中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一种热情，或者说彼此之间的社会团结纽带就在这样临时形成的集体中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信仰力一般的情感，被投射在祭典的活动之上。人们被这样一种集体热情鼓舞着，个体产生了一种超越个人层面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或属于某个神圣的事物（如神灵或神器），或属于乡村、街道，抑或仅仅属于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群体。但无论如何，参与其中的个体都能够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群体成员身份。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祭典所体现的信仰观念就产生了，“我们”（而不是他者）的神灵得到了祭祀，“我群”内部完成了情感的释放与相互联结。这也就意味着宗教所体现的地域社会的集体感得到了再生产与表述，换句话说，祭典的盛大、持久与热烈，象征着日本地域社会中集体生活的力量。

祭典有什么样的功能呢？一方面对于游客而言，祭典是一种地域社会中的文化，作为一种新奇体验，祭典总能带给人们欢乐、庄严乃至艺术的享受。同时另一方面，对于地域社会中的成员来说，其可以通过祭典的仪式来维持与神圣之间的关系。作为神圣下属的一份子，个体在祭典中能找到与其他行动对象彼此之间的联结纽带，使得相互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产生共同的情感与归属。在这样的认识中，地域社会本身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被表述。这样，地域社会通过祭典这一表象再生着内部的道德与团结，社会由此得以维系与不断更新。

2. 祭典与日本地域社会

日本据说全国每年共有三十多万场祭典，而在《信仰的开花》一书中，林承纬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其中可能是最具特色的十多场。在形形色色的祭典中，我们固然可以了解到作为“日本”整体象征的文化现象。但这之中更让人着迷的，可能是不同祭典中对于地域社会的表述。换句话说，人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自然、社会及政治等方面的约束下，人们的交往总是处在一定的半径之内。定居环境下，有限的社会交往使得人们的行动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在不同时节、不同地域的祭典中，人们不同的穿着与行为选择，能够让我们了解特定地域社会中的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独特性。

在日本社会中，祭典的举办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往往越盛大的祭典，越

要动员大量的人财物力。而能够做到应付自如，要依靠一直以来日本地域社会中的自治传统。日本的村落或是街区，往往因为较高的自治能力，而可以被视作是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性的地方行动者，在祭典中，其构成了地域社会中的组织与实施者。林承纬先生在《信仰的开花》一书第275页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主角是“贩售盈余支援民俗文化财传承事务的贩卖机”。在这一机器上购买饮品，盈余会被用以支持当地主要祭典的组织与举办。地域社会中的行动者由此可以在这一宗教性的社会活动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参与到对文化、信仰乃至社会的建构中。当祭典的资金、人员、材料以及所需的行动都来自地域社会内部时，这一宗教文化活动所象征的社会也就越来越明显地为我们所察觉到。

与自动贩卖机这一资金募集行动不同，但逻辑上却相通的是，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年龄阶梯制在祭典的组织与举行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日本传统社会中按照年龄将成员纳入儿童组、青年组及老年组等社会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在地域社会中承担着诸如防卫、治安、组织活动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意味着地域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对内部成员进行着动员与分工。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当地方行动主体试图表达自身的主体性时，总是需要在人力、物力与财力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投入。

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地域社会对行动者的约束性被一定程度地解构，但日本社会中类似年龄阶梯制的地方性规范仍在延续。这一年龄阶梯制形成的不同年龄集团，也因此成为日本地域社会中自治的重要行动主体。所谓自治，从这方面看也即包括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等等。由于被纳入各种不同的地域社会组织，对于一些日本人而言，若是自己无法参加所属社会组织的活动，就需要以赞助金钱等方式进行一种“参与”的表达，否则就有可能被排除在地域社会之外，从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社会”的归属，割裂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地域社会对于违反行动规范的成员存在一定的惩罚机制，由此来维系社会，不至于解体到原子化的状态中。

日本社会较高的自治现象，无论表现为年龄阶梯制下的社会组织，还是表现为城市中的町内会，一定程度上都意味着地域社会拥有保障祭典组织与举行的能力。反过来祭典的举行又强化了人们对地域社会的归属感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与团结。比如《信仰的开花》第92页写道：“稚儿’在

祭典中具重要的宗教象征意义，也因此历来对稚儿的挑选格外慎重……”，这样的活动意味着每当一个祭典即将举办，周边乡村或城市里的街区就会组织内部成员前往参加，行动者由此与他人乃至社会进行着共同的文化创造以及相互塑造。祭典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以外体验超越个体层面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而当这样一种非日常的生活状态按部就班地运行时，日本内部各个在地共同体（local community）的整合与稳定也就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了。换句话说，祭典也就成为了日本社会中社会秩序的隐喻。

三、中国的“地域社会”：日本作为参照

当代社会中，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毫无疑问地出现了一定程度上宗教世俗化的趋势。世俗化（secularization）指的是由欧洲社会现实经验以及学术界的总结抽象而来的，用以概括宗教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逐渐衰落的各种观点⁽⁴⁾。按照世俗化理论的论述，祭典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神道或佛教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将逐渐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分离。由这一理论出发，祭典的重要性也应该随着现代化的展开而逐渐降低，并且表现出参与者越来越少的现象。

然而，林承纬先生却在《信仰的开花》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日本的祭典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成为人们生活意义的创造者。祭典被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视为对日本人而言必要的人生体验，在当代社会中也是日本人社会生活中所常见的文化活动。“西宫神社的十日戎，据说这三天共吸引百万以上的民众前来参拜……”⁽⁵⁾类似的记载意味着祭典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仍然是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一，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祭典场面的盛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这可能意味着宗教信仰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仍然强大，由此祭典的盛行构成了对世俗化理论的重要挑战。其次，这可能意味着即使日本社会中出现了类似世俗化的现象，但人们通过不断地改造与努力，将祭典由宗教信仰活动变成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活

(4) 汲喆，2008，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社会学研究(4): 55-75。

(5) 林承纬，2017。第180页。

动。换句话说，要么信仰的力量，要么文化传统的力量，使得祭典在日本并未展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点。当然，文化的变迁若只强调单方面的作用，难免有将社会现实简单化的倾向，毋宁说日本社会中祭典的变化原因二者兼而有之。祭典所经历的并非单一向度的变迁，这之间的转变过程是具体而复杂的。但是，无论我们对日本社会中的祭典持何种解释路径，都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现象中展现出了地域社会所具有的强大自治及行动的力量，也即日本社会对祭典的组织、动员与参与能力。

对于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从事与民俗学、人类学或社会学有关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可能这一点正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并认真思考的现象。费孝通曾经提出，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⁶⁾，横向上如同石子投入水中一样，涟漪一圈圈散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纵向上则是长幼尊卑有序。这一体系也相应地建构起了传统中国的地域社会。很多活动，如祭祀或庙会等，都在以宗族、村落、交通要道或经济中心等为主要形式的地域社会中进行。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 及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 等人的研究为我们做了极其有益的说明⁽⁷⁾，在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也能找到传统社会中地域社会在水利、交通、农业以及资金等方面互利互助的记载。

然而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用陌生化、半熟人化或理性化等词汇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趋势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中由于流动性增强而带来的个体之间持续稳定的交往越来越少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也将我们纳入了一个全新的叙事环境：中国人之间似乎缺少这样一种对地域社会的隶属关系，也即我们缺少对某种在地组织 (local society) 的归属感。按照波兰尼 (Karl Polanyi, 1886–1964) 和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1943–) 等人的看法⁽⁸⁾，个体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但部分研究者针对中国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论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个体脱嵌于社会的

(6)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0–11页。

(7) 关于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等人的相关论述, 参见弗里德曼, 2000,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刘晓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施坚雅, 1998,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关于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等人的相关论述, 参见波兰尼, 2013,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黄树民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可能性。姑且不论这样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但研究者对这一方面的关注确实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的地域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若从这个视角来看，相比于处在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中的日本，中国反而表现出了更强的个性化倾向性。那么，当代中国的“地域社会”在哪儿呢？

不少关心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状况的研究者在面对诸如传统服饰、文化艺术、手工艺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变迁现象时，常常表现出“丧失式叙事”的态度⁽⁹⁾，发出惋惜的感慨，呼吁通过记录与保护等方式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研究者常常认为在这些传统文化上能够找到共同的社会历史，如果无法得到保护与传承，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格、文化、记忆或其他生活经历的丧失。然而这样一种“丧失式叙事”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同当前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如何让这些传统文化重新成为与人们生活相联系的，活着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身体性”⁽¹⁰⁾，即人们亲力亲为的文化。

林承纬先生及《信仰的开花》一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去分析传统文化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问题，去分析这些文化如何通过在地组织而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意义的生产对象。换句话说，即从“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可操作的理论视角与概念工具。事实上，虽然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但其实并不缺乏类似日本祭典这样的地方性活动。在部分华北农村举行的庙会常常能够吸引周边数个县市、十万以上的人们前往参加，场面之盛大不亚于林承纬先生对日本祭典的描述⁽¹¹⁾。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失落，可能存在巨大的分化状况，处于动态的张力之中。因此，与其感叹优秀历史文化的丢失，不如以“地域社会的组织”这样的对象为突破口，探讨中国社会中文化变迁的具体路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类似日本年龄组织或町内会一般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或许一定程度上就能够更好地回应研究者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

(9) 有关“丧失式叙事”，参见刘正爱，2013，谁的文化，谁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认知困境与理性回归，民俗研究(1): 10-18。

(10) 张青仁，2009，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民俗研究(2): 36-44。

(11) 例如研究者对“龙牌会”的关注，或是对定州市北齐庙会的关注。

四、对日本而言：异文化的视角

另一方面，《信仰的花开》这本著作或许不仅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现实可操作的理论路径，对于日本人而言可能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识视角。贾岛诗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们常常因为身处一定的环境之中，由于对内部的规则与秩序过于熟悉而无法看清全貌。因为在内部成员看来，一切都太过自然，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对于异文化的行动者而言，由外向内来看的视角或许能够提供更多的观点碰撞与思维火花，引发对“例常”的探讨，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从理论上说，除了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世界以外，还存在一个建立于个体主观认知以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之上的意义世界，即生活世界（lifeworld）。在这一世界中存在一个意义的结构体系，使所有物与对象被整合进一个秩序结构之中。由此世界对于个体而言变得可理解，个体在这样的世界中可以例行的生活，获得一种本体性安全。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世界及意义体系的存在，使得我们往往因为身在其中，而难以看到社会建构过程的具体性、地域性以及丰富性。

日本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并非早于社会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这一建构意味着意义的赋予过程。为什么要举办祭典？祭典的资金从哪儿来？祭典活动上的参与者有什么要求？为什么要以自动贩卖机的形式筹集资金？……非常多的类似对象与行动过程，在日本人看来可能具有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性质，早在数十年前可能就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活动，当前人们只不过是沿袭传统来组织罢了。然而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认识中，一些对于民俗学、人类学或社会学而言有意思的内容往往就被“理所当然”的想法所埋没。

林承纬先生以一个对日本人而言“外部人”的身份进入日本进行田野调查。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在于其并未事先接受一套日本人所认可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因此在日本祭典当中，其能对很多在日本人看来是正常的，但是在他者看来却是陌生的、不理解的或是能够激起思考的现象进行记录与分析。比如前面提到的“贩售盈余支援民俗文化财传承事务的贩卖机”，或是在第一章中对日本“石崇拜文化”的介绍分析等等。有可能对本书的日本读者而言能够带来一些思想上的启发与激荡。

这一过程意味着对于民俗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者而言，不仅需要探讨“异文化”社会中所发生的现象（这可能是早期人类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而且也有必要了解身处异文化的研究者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研究。在这样一个观点的交流与互动中，我们不仅对于对方文化能够较好地了解，同样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文化所发生的变化与出现的问题时，有可能获得一些全新的认识。从这一点看，《信仰的开花》一书对于日本相关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

总的看来，林承纬先生所著《信仰的开花：日本祭典导览》一书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专业研究人员而言都可谓是一本不错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普通读者而言，无论是对日本文化、祭典、信仰抑或风景感兴趣，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所需的内容。本书装订精致，内容亦比较充实，相信读者在徜徉于日本祭典的同时，能够享受阅读的过程。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本书中的内容也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适于社会的广泛阅读，相信也能引起研究者的思考与讨论。